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
山东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资助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lk Culture 2016**

中国民俗文化 发展报告 2016

主 编 张士闪 李 松
副主编 王加华 许雪莲

山东大学出版社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lk Culture 2016**

责任编辑 陈海军
封面设计 张荔

ISBN 978-7-5607-6076-6



9 787560 760766 >

定价：60.00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
项目批准号：11JBGP050
山东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资助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lk Culture 2016

中国民俗文化 发展报告 2016

主 编 张士闪 李 松
副主编 王加华 许雪莲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6/张士闪,李松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 2
ISBN 978-7-5607-6076-6

I. ①中…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报告—
中国—2016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4937 号

责任编辑:陈海军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0531)88363008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省英华印刷厂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4.75 印张 27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6)》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刘铁梁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委 员

赵世瑜 北京大学教授

黄永林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张 刚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刘德龙 山东省政协文史委主任

周 星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

目 录

总报告	(1)
2015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总报告	(3)
一、2015:民俗文化发展的界别特征	(4)
二、2015 年度中国民俗发展考察的九个发现	(7)
三、2015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五项建议	(13)
2015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16)
一、理论探讨	(16)
二、田野研究	(26)
三、民俗文化发展策略	(35)
2015 年度城镇化建设与民俗文化发展	(46)
一、2015 年中国城镇化建设与民俗文化发展概况	(46)
二、传承与再造: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传统民俗	(59)
专题报告	(67)
节日日常化与日常节日化:2015 年度中国节日文化发展报告	(69)
引言:2015 年中国节日的基本生态	(69)
一、方法论: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理解“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	(70)
二、现代化与传统节日的嬗变	(73)
三、多元主体共同建设的新节日传统	(75)
结 语	(81)
2015 年度中国婚俗发展报告	(83)
一、结婚花费日趋走高	(83)
二、网络下乡和新媒体环境下的婚姻	(92)
三、中式婚礼复兴	(96)
四、国家和政府部门对婚俗的管理工作有所加强	(99)
五、2015 年度中国婚俗问题发现	(101)

六、对策与建议	(102)
2015 年度中国葬俗发展报告	(104)
一、人们心系环保,绿色殡葬却叫好不叫座	(104)
二、殡葬暴利长期存在	(106)
三、葬礼脱衣舞事件成为社会焦点广受谴责	(110)
四、葬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0)
五、反思与解决办法	(114)
2015 年度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报告	(116)
一、2015 年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动态	(116)
二、非遗名录与国家级课题中的民间信仰	(125)
三、民间信仰的当代发展:基于妈祖的个案研究	(137)
四、总结与展望	(153)
2015 年度民俗学视角下的灾难研究	(157)
一、绪论	(157)
二、灾难中的大众话语叙事	(161)
三、灾难与民间信仰	(174)
四、结语	(178)
2015 年度网络谣言与民间话语研究报告	(181)
一、图像谣言在网络传播中日渐兴盛	(181)
二、民族主义谣言逆势生长	(194)
2015 年度西南民族民间文化发展报告	(211)
一、发展态势分析	(211)
二、存在的问题	(226)
三、对策建议	(228)



总报告

2015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总报告

张士闪 李海云*

有着长达数千年厚重积累优势的中国文化,其发育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其人文内涵体现于丰富多元的区域社会生活之中。无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艺匠百工、贩夫走卒,都传承共享着同一个中国文化。民间社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载体,民间传承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活态传承形态,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与传承发展离不开民众生活实践。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背景下,中国民俗文化日益显现出较强的“创生性”,成为当今社会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社区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鉴于此,我们将“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社区发展”作为本年度考察民俗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一,其中暗含着四个理论基点:第一,自古及今,礼俗互动传统奠定了我国国家文化治理与社会生活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体现出一以贯之的国情特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礼俗教化,形成了基于农耕经济的良好共享性传统,它以社区公共利益的高度共享来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以社区节庆、历史传说、生活礼仪、生产互助、集市商贸、乡规民约、民间手工艺、信仰仪式等民俗传统为传承载体,构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良好社会基础,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梳理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形式,总结其制度机制、道德规范和技术手段体系,可收“古为今用”之效。第二,民间社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载体,民间传承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活态传承形态,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与传承发展离不开民众生活实践。从民俗文化入手,关注中国文化在民间传承的历史与现状、形态与路径、实践与机制,才能真正构建起包括研究阐发、教化推广、实践养成、保护传承、传播交流等的中国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完整体系。第三,表征着当代民间传承机制的民俗文化,贯穿着一方民众的集体意志与生活智慧,承载着民间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是一种相对稳

* 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云,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员。

定的群体行为规范。在当今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激活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是凝聚人心、提升发展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是和谐社会关系、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是安顿“乡愁”、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根本。第四,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发展风险大大加剧。在我国很多地区,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程度不高,道德底线下滑,精神家园荒芜,各色价值观趁虚而入,各种极端观念、外来宗教趁机入侵并有蔓延趋势。复兴与重构中国文化的当代民间传承机制,将弘扬文化传统与服务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国文化精神深刻融入民众生活中去,能够为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基于上述考察背景,本报告在具体操作层面,在依然沿用已有模式中“三个注重”^①的基础上,将“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社区发展”作为 2015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界别特征,以此为线索梳理脉络,发现问题,建言献策。

一、2015:民俗文化发展的界别特征

古往今来,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国家政治的倡导、地方社会的贯彻与民间生活的实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得以落地生根,中国社会经由文化培育而为“礼仪之邦”。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国家、精英和民众构成了多元主体,国家意志、精英作为与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时至今日,随着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普及,民俗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但民间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葆育传承能力是惊人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今仍以较为完整、活态的民俗生活方式在继续传承,并借助民间社会的内部逻辑,在与现代化进程的对撞中产生了创新发展。

对于民俗文化发展而言,国家行政运行无疑是起着奠定格局的主导作用。在 2014 年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讲话。关于国家软实力,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包含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两个方面;第二,继承、借鉴与创新,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文化创新;第三,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具体而言: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跟发展国家硬实力对接,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建设文化强

^① “三个注重”包括:一是注重考察年度民俗活动的现场性与创生性特征;二是注重把握年度民俗活动的“节点”事件,通过对“节点”事件的深入阐释,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呈现年度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纹理与发展脉络;三是注重树立“大民俗观”,不仅考察年度民俗发展中传统民俗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创生,以及现代性活动中的新生民俗,更要关注民俗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的“再嵌入”问题。(参见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国,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该政策在 2015 年社会发展中持续落实,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社区建设得到很大推进。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即为了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将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广泛展开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计划,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5 年 12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明确了国家发展战略及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在“十三五”规划中,对目前民俗文化保护能力的现状认知更加明确,各项工作思路更为清晰。从上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和决策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整体社会的发展及国家的未来走向都具有一定的决定性力量,如何发展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

当然,国家战略终究需要借助行政运作落实到基层社会,基层社会的良好发育与有序运行是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一方面,当代基层社会结构松散,组织性差,阶层分化加速,公共文化疲软,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各地民众又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热情,民俗传统正处于不断的调试和改变中,以适应当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态势,并呈现出进入政府主导框架后的“再规范化”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乡村地区在原有的红白理事会、民间文艺、民间信仰等自发组织的基础上,又重建或新建了老人会、庙委会、乡贤理事会等新的组织,积极地参与地方社区公共事务。

总体来说,2015 年度的民俗文化发展给予我们如下启示:

(一) 强化民俗文化的社会交流特性,为中国文化的活态传承奠定深厚基础

在当代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普遍注重传承与活用民俗传统,体现出主动建构社区生活的文化传承与创造精神。文化的本质属性是流变,这就决定了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各类民俗活动的变化与创新是一种常态。因此,绝对要求民俗文化保持“原汁原味”是不可能的,不能片面地用是否“原汁原味”作为标准来评判所有民俗活动实践,进而简单、粗暴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排斥创新发展,限制文化交流,甚至极端地强调其封闭性。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新型城镇化决策的继续推动下,城市与乡村的民俗活动处于更加密切的互动态势。应准确地把握民俗文化

活动因不同而多彩、因交流而繁荣的动态共生关系,努力创造合理机制,强化民俗文化的社会交流特性,探索实现其活态传承的当代模式,促进乡土社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地区民俗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手段,可以在当代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深入理解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智慧及其当下传承创造,已成为当下民族复兴的重要议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与保护实践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如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亲民”“为民”特性,凸显其共有、共享、公益的社会属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激发地方社区生活文化创造的活力,优化提升地方社区的秩序、安全感和幸福感,优化当下和未来的社会交流及发展的秩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宏大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智慧与路径。在更长远的意义上,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改进设计研究,促使国家文化建设与民众日常生活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在以国家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优化与社会和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基础。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对民俗文化的诸多方面都进行着潜移默化地解构和重构,从而产生了新的民俗文化生长点,创造了新的民俗功用,践行着民俗的活态化传承。在当今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和移动互联网络的普及流行,人们的交流模式逐渐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传统民间话语的主体、话语场以及民间话语的影响也都随着发生了变化。

当前中国城乡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不仅基层社会关系在快速地变化,而且不同地区的变化也不平衡。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框架或经济杠杆给予完善解决。以民俗文化助推地方社区发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新观念。具体而言,需要借助广大民众强有力的主体行动参与,推动民俗传统在国家社会发展整体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消除整体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隐患和风险,当是实现民俗“活态传承”的重要保障。

(二)民俗文化发展的前景在于融入当代社会发展,激活地方社区活力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所谓“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全球性趋势下,关注地方社区文化的价值和传承,采取积极行动促进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不仅使地方民众受益,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珍视与保护,并促成地方文化资源向普惠全人类的共有文化财富转化。民俗文化在当代地方社区中的保护发展,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治理之间,是长期互动、互益互补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民俗本是在民间形成与传承的传统,具有多样性、地方化、生活化的特征,而国家社会

治理则属于顶层设计与宏观管理,具有统一性、标准化、制度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国家社会治理又是以广泛的生活实践为支撑的,离开了民众的认同与贯彻,国家社会治理便无从谈起,而良好的地方社区民俗文化遗产体系将为各项国家政策的落地提供适宜条件。在国家政治改革持续向社会生活落实的过程中,将民俗在地方社区中的发展,与国家社会治理有效对接,对于当代社会整体发展具有表本兼治的深远意义。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展,城镇人口日益增多,乡村人口相应减少,城乡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乡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乡村人成为城市人的进程而发生,这不仅是民众社会身份的变化,其劳作模式、生活习俗也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调适性变化。2015年,中国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加快,依附于传统村落生活的民俗文化展现出新的内容,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民众生活中。有许多学者为中国民俗文化传统的流失而感到焦虑,然而,我们近年来在北京市各区县的民俗文化普查却发现,民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诸多民俗传统依然保持了强劲活力。面对着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巨变,大多数民众都能够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生活的变化,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民俗文化,而且正在逐渐凝结为生活传统。这充分说明,民俗文化自始至终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通民众也始终在根据自己的生活变化来改变、创造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作为“生活层面”的文化,在民间拥有着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反过来说,民众以改造旧民俗、创造新民俗的方式,主动适应城镇化建设的努力,才是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希望所在。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创造力,民俗文化在融入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具体表现形式,值得关注与总结。

二、2015 年度中国民俗发展考察的九个发现

(一) 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推动当代社区发展,彰显社区活力

2015年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参与或组织的民俗文化活动,包括民俗文化节、民俗旅游、民俗进校园或社区、民俗村建设、民俗旅游产业、民俗博物馆、传统村落保护等形式,以传统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与保护为指向,使民众在参与民俗活动的过程中找到乡土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节日是一种活态传承的生活文化表现形式,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

基本依据。尊重普通百姓的文化记忆、民间信俗和日常生活方式,是打开认知、理解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窗口,是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基础。因此,各地政府在传统节日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民俗文化活动,就成为一种常态性的选择。2015年春节期间,山东省继续推出“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突出“山东好年,客来山东”主题,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年节旅游消费需求,营造出浓郁的年味民俗文化活动。在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中,乡愁更多的凝结为老市民心中的古镇情怀,第四届民俗文化节推出的“乡愁——古镇记忆”主题便普遍勾起了人们的童年记忆。

2015年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一大显著变化是,基于近年来持续进行的“民俗文化进校园”“民俗文化进社区”等活动,民俗文化开始真正扎根于校园和社区的迹象。特别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逐步快速,越来越多的村民变为市民,村落变成了社区,民众对民俗文化的需求愈加强烈。中小學生通过听老师讲解和亲自观看、体验等多种形式领略传统民俗,民众通过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组织的民俗活动中来,对因城镇化建设而失落的传统民俗生活有所连接。与城镇化建设共同进行的是传统村落的保护,老建筑留存或民俗传统深厚的村落被挂牌为民俗文化村或不同层级的传统古村落,政府通过修旧如旧、组织民俗文化展演等方式,在保护的同时有序进行村落旅游开发。由此,古村落保护与民俗旅游开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基层社会建设的关系,成为当今社会及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定,是国家对现有民俗文化的有目的性的选择,并赋予不同层级的荣誉与经济资助,改善其生存与传承的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毕竟传承于民间社会,贯穿着一方民众的集体意志与生活智慧,承载着民间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行为规范。在当今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于基层社会建设的作用,是提升基层社会发展能力、凝聚人心的基础性工作,将中国文化精神深刻融入民众生活中去,能够为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安顿“乡愁”、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根本。

因此,2015年度诸多学者注重从国家政治层面、地方生活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立体的探讨,其共同特征是两个:(1)强调民间社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载体,民间传承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活态传承形态,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与传承发展离不开民众生活实践。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国文化在民间传承的历史与现状、形态与路径、实践与机制,试图构建起包括研究阐发、教化推广、实践养成、保护传

承、传播交流等的中国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完整体系。(2)基于国家相关战略,结合各地农村的发展现状与文化特色,探索如何在国家行政与乡村民众的共同合力下,运用传统文化伦理,优化礼俗互动的民间传承,促进农村宗法制度与法制建设的融合,在促进城乡深度融合、破除城乡发展不均衡难题的意义上,构建乡村社区的经济共益、文化共享、发展共谋、社会共建模式,凸显乡村社区建设中的文化重构与创造的重要作用,实现乡村振兴之路。

显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具体实施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人。作为民众生活实践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关联极为密切,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增强社群凝聚力,维系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纽带;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对于构建和谐社区、敦亲睦族、完善个人修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培植民众对所在社区、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激发其文化自觉;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有望对增加居民经济收入有所帮助。

(三)田野调查普遍为人文社科研究所重视,相关成果被各级政府有所吸纳借鉴,发挥了建言献策的功用

田野调查,作为一种获取资料方式与实证研究方法,注重对第一手田野材料的挖掘与分析,能够向社会提供一份可信的国情资料。如今,除了传统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外,它已受到越来越多学科的广泛重视,如艺术学、体育学、音乐学、舞蹈学、民间文学等。田野调查主张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与活生生民俗主体的接触与交流,从而真正进入并理解民众的“生活世界”。在2015年度,“贴紧乡土做研究”成为颇具声势的学术研究潮流,田野调查领域广泛涉及社会转型与城镇化、民间艺术、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乡村宗族、市民活动等诸方面。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影像等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日益普遍,体现出当下技术与学术发展的新潮流。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各级政府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走群众路线”等活动,也注意吸收学界已有的田野作业成果,二者有合流趋势。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学界在田野研究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建言献策也蔚成风气,体现出日益鲜明的社会担当意识。

(四)以当代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为背景,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治与民俗传统之间的礼俗互动智慧日益受关注

21世纪以来,随着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的迅速普及,乡土民俗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乡土村落正经历巨

变。但无论如何,村落依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农民是绝不可轻忽的文化传承主体。

一方面,民俗的本质是民众主体的文化创造,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促使某种价值规范发生从世俗到超验的升华过程。再有力的国家行政运作,也无法随意篡改民俗传统或改变村落社会的民众主体性质。在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民俗传统不仅没有遁隐,而且变得更富弹性与多元。另一方面,在跟民俗的形成与发展自古以来一直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引领作用。“民俗”作为现代学术概念,也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而为知识精英所发明并设置意义的。

中国很早以来就已形成所谓的“礼俗社会”,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复杂社会系统,在民间生活与国家政治之间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同生共存关系。纵观一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国家意识形态经常借助于对民俗活动的渗透而向乡村生活中贯彻落实,形成“礼”向“俗”落实、“俗”又涵养“礼”的礼俗互动的政治框架。礼俗互动,既是民众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并阐释自身生活,也体现为国家向民众提供认同符号与归属路径。借助民俗文化的多种形式,民间社会始终发挥着对于主流文化的葆育能力。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社会悠久历史进程中的“礼俗互动”,起到了维系“国家大一统”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作用。^① 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形塑着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也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活层面的文化交织现象。因此,国家政策在民俗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古及今,礼俗互动传统奠定了我国国家文化治理与社会生活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这是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国情特色。

(五)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建构中,当代节日的“日常化”特征日益明显

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与当代社会结构的巨变,传统节日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衰微状态。以此为背景,包括政府、商家、知识精英、民众以及多种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元主体,从各自立场出发,试图赋予传统节日有所建构,或创造新的节日。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伊始,就致力于赋予传统节日以新的内涵或创造新的节日,以教化民众,强化国家认同,同时服务于经济发展。20世纪的中国节日,大致经历了政治动员、经济驱动与文化认同的三个阶段。时至今日,以传统价值回归为表征的文化认同成为一大趋势,并呈现出多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丰富实践。以商业资本作为支撑,包括“双十一”、圣诞在内的部分“消费狂欢型”节日,迎合了当

^① 参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